

法国哲学戴面具的哲学家

[法]M. 福柯 / 文 莫伟民 / 译

C. 德拉康帕涅(Christian Delacompagne)问(下同): 首先, 请允许我问您, 您为何选择作者匿名(I' anonymat)?

福柯答(下同): 您知道心理学家的故事吗?他们刚刚在非洲腹地的乡村里试放一部简短的影片。他们接着让观众叙述自己所理解的故事。好吧, 在这有三个角色的小故事中, 观众只对一件事感兴趣: 林荫通道和透过树林的光线。

(但)在我们这里, 角色为视觉制定法则。人们的眼光有偏向性地落在来来去去、出现又消失的人物上。

我为何向您提示我们匿名发表作品呢?这是为了怀旧一个时代, 在那时, 由于不完全为人所知, 所以, 我所说的一切就会有几分机会被人倾听到。与可能的读者接触并无障碍。书本的影响波及到无法预料的场所并勾勒出我所没有想到的种种形式。名字是一种方便。

我提出一个游戏: “无名字年代”的游戏。在一年内, 人们出版无作者名字的书。批评家们应设法应付作者匿名。但我想, 他们可能没有什么可说的: 所有的作者都会等到下一年出版他们的书……

问: 您认为今天的知识分子讲话太多了吗?他们用他们的话语动辄不适当地纠缠我们吗?

答: 知识分子这个词在我看来有点怪异。我从未遇到过知识分子。我只碰到过写小说的人和治病的人。我只碰到过从事经济研究和为电子音乐作曲的人。我只碰到过教书的人和绘画的人, 以及我不知道其在从事什么工作的人。但我从未碰到过知识分子。

相反, 我碰到过许多谈论知识分子的人。由于听他们讲, 我就形成了关于这个家伙能是什么的想法。这并不困难, 应受指责的是知识分子。几乎都得受指责: 谈话、沉默、无所事事、凡事都要介入……简言之, 知识分子是要加以评判、宣判、谴责和排斥的原材料……

我不觉得知识分子讲得太多了, 因为他们对我来讲并不存在。但我感到有关知识分子的话语在蔓延, 这令人不太放心。

我有一种令人讨厌的怪癖。当人们在这样空谈时, 我就设法想象这在现实有什么样的含义。当他们“批评”某人时, 当他们“揭示”其思想时, 当他们“谴责”他写的作品时, 我是在理想境遇中来想象他们的, 他们在这个境遇中拥有针对他的所有权力。我径直返回到他们所使用的词的初始含义: “摧毁”、“打倒”、“归于沉默”和“埋葬”。我看到美好之城微微开启了, 知识分子囚禁在里面, 而且如果知识分子曾是理论家的话, 那知识分子肯定还将被绞死。的确, 我们仍未处在这样一个体制内, 知识分子在该体制内被打发去种田; 但事实上, 请告诉我, 您听到过有人在谈论某个叫T. 内格里(Toni Negri)的人吗?他难道没有作为知识分子而被囚禁吗?

问: 那么, 是什么促使您以作者匿名作掩护呢?是当今的哲学家使自己的名字用于广告或任凭他人这样做吗?

答: 这并没有冒犯我。我在上中学时的学校走廊上看到伟人的石膏像。而现在, 我是在报纸第一版的下方看到思想家的照片。我不知道审美观是否提高了。经济合理性肯定是……

我被康德在已经非常年迈时所写的一封信深深地触动了: 他叙述说, 他克服年老、视力下降和想法混乱等等困难, 赶快写完其中一部书, 去赶集比锡的集市。我讲这个故事是为了表明这无足轻重。广告与否, 集市与否, 书应另当别论。我从来都不认为因书的作者出现在电视上而认为书是坏书。但我也从来不认为由于他出现在电视上, 他的书就成了好书。

因此, 如果我选择作者匿名, 这并非为了批判这

样或那样的事, 我从不这样做。这是我更直接地与可能的读者讲话的一种方式, 在此, 我所感兴趣的惟一角色是: “既然你不知道我是谁, 你就不想为我说了你所读的寻找理由; 让你完全自言自语地说: 这对, 那错。这令我高兴, 那不令我高兴。这是一个要点, 这就是一切”。

问: 但公众难道没有指望批判能赋予他们关于一部作品价值的确切评价吗?

答: 我不知道公众是否期望批评家评判作品或作者。我相信在批评家能说出想说的以前, 评判就已经存在了。

似乎库尔贝有位朋友在夜间叫喊着醒来了: “评判, 我想评判”。人们喜欢评判, 这真是疯了。人们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进行评判。可能, 能提供人类去做的最简单的事情之一就是评判。您们熟知当最后的一笔勾销最终把最后的对手化为灰尘的时候, 最后的人就坐在高低不平的桌子后面, 开始起诉责任者了。

我不禁想到一种并不设法评判, 而是让书本、作品、句子和想法存在的批评; 它点燃了火把, 看着草地生长, 倾听风声, 抓住空中的泡沫, 使之洒落在地。它增加的, 并不是判断, 而是生存的象征; 它呼唤这些象征, 弄醒它们。它有时还创造它们吗?好极了, 太好了。凭借宣判进行的批评让我厌倦; 我喜欢闪烁着想象力的批评。它既非至高无上, 也不是红色信号。它包含着可能产生的风暴的闪电。

问: 那么, 有许多事要让人了解, 无论是有趣的工作, 还是媒体都应该随时谈论哲学……

答: 的确, 在“批评”与写书的人们之间存在着一种传统的苦恼。一方感到被误解了, 另一方则认为人们想把自己与抨击联系在一起。但这是一种游戏。

在我看来, 似乎今天的境遇极其特殊。我们的规章制度匮乏, 而我们却处于过剩的境遇之中。

所有的人都注意到, 通常伴随着著作的出版(或重版)而出现的颂扬, 这些著作有时是有趣的。它们只是“破坏了所有的规章”、只是“当代文化的对立面”、只是“对我们所有的思考方式作了根本质疑”。其作者应成为一个被埋没的边缘人。

反之, 必须确信其他作者应被打入冷宫, 永不翻身; 它们只是“一种不值一提的模式”的渣滓, 是对规章制度的简单重复, 等等。

有人说, 这是一种巴黎式的浅薄现象。我从中感到一种深深不安所产生的后果。这是一种“没有位置”、“他或我”、“都得轮到”的情感。由于我们借以可倾听和被人倾听的空间极其狭窄, 我们就一个接一个排着队。

由此产生了一种焦虑, 它渗透进许许多多有趣但不太滑稽的症状中。由此, 在写作的人那里产生了他们在媒体面前无能为力的感觉, 媒体指责他们支配着书的世界, 并使那些他们感到愉快或不适的东西存在或消失。由此, 产生了批评家们的感觉, 除非提高嗓门和每周变换新的花样, 否则就无人倾听他们。由此, 还产生了一种虚假的政治化(une pseu- dopolitisation), 它在领导“意识形态战斗”或驱逐“危险思想”的必然性名义下, 掩盖了既不被阅读又不被倾听这样一个深深的忧虑。由此, 还产生了对

权力的幻想性恐惧：所有写作的人都行使了一种令人不安的权力，对这种权力必须努力设定一个期限，至少也是一些限制。由此，同样产生了稍具咒语性的断言，即实际上，所有的东西都是空洞的、荒芜的、没有旨趣、没有重要性：这个断言显然来自那些自身什么都不做却感到别人做过了头的人。

问：然而，您难道不认为我们的时代实际上缺乏与其问题相符的精神和大作家吗？

答：是的，我不相信没落的老调、作家缺乏的老调、思想贫乏的老调、思想境界受阻和暗淡的老调。

相反，我认为这是过多了。因为我们并不苦于空洞，而是苦于很少有手段来思考所发生的一切。而要知道的事又很多；根本的或可怕的、极妙的、滑稽的、既细小又重要的。于是，就有对知识的巨大好奇心、需求或欲望。我们总是抱怨媒体充斥了人的头脑。这个想法是愤世嫉俗的。相反，我认为人们有反应；我们愈想说服他们，他们就愈自问。精神并不是没主见的。这是一种起反应的实体。知识意志愈强烈，就愈能更好地进行灌输。

如果您承认这点，如果您进一步认为在大学和别的地方有一群人能充当这一大堆事情与这种对知识的渴望之间的交流者，那么，您就能很快从中推演出大学生的失业是最荒谬的事情。问题在于增加有线电视、聚光灯、新闻手段、电视和广播网、报刊。好奇心是一种依次被基督教、哲学和某个科学概念斥责的缺点。好奇心是无意义的。但这个词我喜欢；它对我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它令人想起“关切”；它让人想起人们对存在和能存在的一切的关心；这是对现实保持警觉的意义，但从未在现实面前静止不动；这是一种发现我们周围有什么奇特和特殊的灵敏；是某种使我们打乱我们所熟悉的事情并换一种方式看待相同事物的奋斗；是一种想把握正在发生和逝去的事情的活力；是一种对在重要与根本之间存在的传统等级表示出来的洒脱。

我梦想着好奇心的新时代。我们拥有好奇心的技巧方法；欲望在这里；要认识的事物是无穷的；能胜任这个工作的人们存在着。人们苦于什么呢？人们苦于小范围的、平庸的、准垄断的、不充分的有线电视网过份少了。无需采取保护主义态度来阻止“坏”新闻的侵入和压制“好”新闻。而是必须增加活动渠道和可能性。在这个领域，决不存在柯尔柏主义(Le colbertisme)②！如同人们通常所担心的，人们不希望说得整齐划一和平均化。而是相反，是不同网络的差异和同时性。

问：我设想在这个层面上，媒体和大学不是继续对立，而是能开始起相辅相成的作用。

答：您想起了s. 列维(sylvain Levi)极妙的话：教育，即当有一位听讲的门徒的时候；当有两位门徒时，这就成了普及。书本、大学和学术杂志都是媒体。必须避免只把人们不能或不想接近的新闻渠道称作媒体。问题在于要知道如何使这些差异发挥作用。在于知道是否必须为受新闻巨兽威胁的脆弱的学者建立一个保护区，一个“文化公园”，而这个空间的其余部分就处在一个次品充斥的大市场。在我看来，这样的划分并不符合现实。更糟的是：这个划分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为使有用的差异起作用，不应该有这样的划分。

问：我们有可能提出几个明确的命题吗？如果一切都不顺利，从何处着手呢？

答：但这是不会的，不会一切都不顺利。总之，我认为不应把针对事物的有益批判与针对人的反反复复的令人生厌的哀诉混淆起来。至于明确的命题，如果几个一般原则不首先被接纳，那么，它们就只能显现为小玩意儿。首要的原则是：认识的权利不应该保存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和个人的某些范畴里，人们应能够不停地和以多种方法行使这个认识权利。

问：这个认识的渴望难道不模棱两可吗？从根本上来讲，人们将怎样处置他们将要获得的所有知识？知识在哪方面对人有用？

答：教育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使个体的形成伴随其在社会中的位置的确定。今天必须把教育视作这样的方式，即它使个体能凭自己的意愿发生改变，这只有符合一个条件才可能，即教育应提供“永久”的可能性。

问：总之，您赞同一个学者社会吗？

答：我是说人们在文化上的分流应尽可能连续不断和多形态。一方面不应该有人们所接受的这种教育，另一方面不应有让人们屈从的新闻。

问：永恒哲学在这个学者社会中会变成什么？……人们仍需要它吗？它的问题仍无答案，它在不可知的事物面前又保持沉默。

答：哲学如果不是一种思考方式(不是思考真和假，而是思考我们与真理的关系)，那么，哲学还能是什么呢？人们有时抱怨在法国没有主导哲学了。这最好不过了。没有至高无上的哲学，这的确如此，但还是存在着哲学即行动哲学。人们凭着哲学运动，仍努力和探索着，梦想和幻想着，摆脱了获得性为真的东西，并寻求其他游戏规则了。在这种哲学中，思想范围发生了移位和变化，获得性价值发生了改变。所有的工作都是为了进行别种思考，做别种事情，成为不同于人们现在所是的。从这个观点来看，这是一个比最近30年都要强烈的哲学活动时期。“学术的”或“理论的”分析、研究、批评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及人们的行为、真实举动、存在方式中的变化，他们与自身和他人的关系中的变化，都是经常性的和相当大的。

我刚才说哲学是一种思考我们与真理的关系的方式。还须补充：哲学是一种思考方式：如果这是我们与真理的关系，那么我们该怎样表现呢？我认为人们实际上已经从事和正在从事一项相当大的和复杂的工作，它既改变了我们与真理的关系，又改变了我们的表现方式。这种变化发生在一系列的研究与整个社会运动之间的复杂连接上。这甚至就是哲学的生命。

我们知道某些人为当前的空虚感到悲伤，并希望观念秩序上来点儿君主制。但那些曾经在生活中已发现新的腔调、新的观察方法、另一种处事方式的人，从来不会感到需要悲叹世界是谬误的，世界是充斥着非存在的历史，并且该是其他人闭口的时候了，以便人们最终能不再听他们的斥责声……

注 释

① 意大利哲学家，帕杜大学教授，工人自治极左运动的思想领袖。因武装颠覆国家、成立颠覆性组织和武装集团而在审判前已被监禁4年零3个月。在被监禁期间，被选为激进议员之后，于1983年7月8日被释放。后因他的议员豁免权被众议院剥夺了，所以法院就向他发出了许多逮捕令，他就流亡法国了。

②17世纪法国的重商主义——译注。

[Michel Foucault, “Le philosophe masque(entre- tien avec C. Delacampagne”, fevrier 1980,)原载: Le Monde, n° 10945, 6 avril 1980; Le Monde-Dimanche, pp. I et XVII, 责任编辑: 张伯霖]

[回主页](#)

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哲学所 邮政编码：100732
电话：(010)8519507 传真：(010)65137826